正　　经

〔清〕宋宗元　编著

董文武　译注

中华书局

前言

一、作者宋宗元的生平

《正经》,初名《巾经纂》。作者宋宗元,字鲁儒,号恚庭(一号光少,又号梅花铁石主人),清代元和(今江苏苏州)人。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享年七十岁。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宋匡业为当朝贡生,性爱梅,咏梅诗成帙为《咏梅诗集》。乾隆三年(*1738*)宗元中举人,先后任直隶成安、良乡知县、天津清河道、光禄寺少卿。辞官归乡之后,将早已荒废的南宋吏部侍郎史正志的万卷堂买下,重新扩建成一座私家宅第花园,以为奉母养亲之所,并沿引"渔隐"旧意,以"网师"自号,更名为网师园。在园中梅花铁石山房潜心著述《巾经纂》*20* 卷、《识字略》*10* 卷、《网师园唐诗笺》*18* 卷等,今均有传本。除此之外,还参加校订过清人秦蕙田礼学研究集大成著作《五礼通考》,清人朱琦序其《巾经纂》云:"生平雅不能局促章句,居官饶干略,殆得力习史,而金匮秦文恭公撰《五礼通考》,先生与校,盖亦志学者。"

宋宗元生活于"康乾盛世"。清朝初期,出现了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但清朝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清政府出于统治的需要,强化思想控制,在文化上对



知识分子采取高压和怀柔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仍然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约束民众。在此形势下，一些儒学之士在尊儒重道的同时大谈明哲保身之道，这就使得明朝后期冯梦龙的《智囊》等所谓的“智慧”之书盛行起来，各种类型的翻刻本、增补本不断出现，如《智囊补》、《增智囊补》、《增广智囊补》等等，但大都创意不多，内容也无所增益。《巾经纂》则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为这种智慧之书的压轴与创新之作，故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卷首又题“续智囊补”。

二、《巾经纂》的内容

《巾经纂》是一部类事类书，仿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集中国古典文化之精髓。全书共分仁、义、礼、智、信五帙，每帙又分四目，成为卓鉴、远猷、伟度、慧力、仁方、政术、粒民、折狱、师谋、经务、讽谕、说辞、控驭、妙应、利导、沉几、穷变、处嫌、释纷、奇谲等二十类，每类各为一卷，共二十卷。卷前皆有小序，后面各段采录纪传体二十三史事实，段后皆附作者论断点评，有的还于卷末会通全卷宗旨。当然，书中前后体例并非完全一致，个别地方也有剪裁失当之处，尤其是所转述的史实与原文，间或略有文字出入。

《巾经纂》的取材范围较为广泛，囊括了清朝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正史记载，上下长达四千余年，共收录五百多个历史故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举人物既有帝王将相、奸雄大儒、富商大贾，也有戍卒小吏、僧侣道尼、市井百姓。所录故事上至经国济世的远猷奇谲、排兵布阵的用兵之道、断案决讼的明察睿智，下至治家理财的精明算计、化险为夷的应变能力、为人处世的方法技巧。所有这些人物事迹大多真实可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精彩的智慧长卷，有助于人们了解当

时的社会与人生。

《巾经纂》内容广泛，基本上是谈论怎样用行为修养来统揽处世的方法和经验，及如何处理政事和治国理民，几乎涉及了从政处世的各个方面。既有初入政坛的远见卓识，交往过程的辨别奸恶，图谋进取的深藏不露，处理事务的深谋远虑，事前筹划的周密细致，又有为官时的宏伟度量、宽容气度、博爱胸怀、从政技巧、理乱之术、用兵之道、驭人之术、用人之道、言辞应对，以及断案、救荒、理财、进谏、平叛、诡智、奇谋等。此外还有怎样避免遭人猜疑暗算，如何因势利导、平息纠纷等相当丰富的内容。

三、《巾经纂》的思想

在《巾经纂》中，宋宗元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儒学之士，体现出其思想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1. 取材求真思想。《巾经纂》中所选事例均出自清朝以前历史上的人物与事迹，尤其多采自春秋战国以来较为可信的史书及后来备受推崇的“正史”中的纪、传。其中，作者所列举众多事例可以在史书中得到印证，这就使得所讲道理和智慧更具有说服力，反映了其严谨的学风。

2. 议论会通思想。《巾经纂》并不是简单罗列历史故事，而是夹叙夹议，在选取的每个典型事例或几个同类事例后面，都随文附加“恚庭曰”，对所涉及的处事方法或人物谋略加以评析，或者对材料来源进行考证，或者对相似事例进行比较，或者对背景材料进行说明，或者对所述内容进行概括。其中，作者对各种计谋背后的心智进行的总结，反映了其在方法论上会通的编撰思想。

3. 儒家道德思想。《巾经纂》体例上分仁、义、礼、智、信五帙，完全是从儒家为核心的道德范畴出发的，所举事例、人物也均



为尊儒重道之人。其中，作者对以下犯上、仆诘主等有违儒家伦理道德的人和事提出了严厉批评，反映了其正统的儒家观念和立场。

4. 明哲保身思想。《巾经纂》为一部谈论从政处世智慧的奇书，所列事例均闪耀着智慧的火花，这就使得人们在品读过程中可以学到众多的经验和智慧。其中，作者从本人角度出发，对列举的士人为官独善其身典范的褒扬，反映了其思想中消极的明哲保身的一面。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思想的保守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些并非公允，对正人君子的权术反复进行辩解，对大清王朝的统治颇多歌颂之词，这是值得我们批评的。

四、《巾经纂》的价值

《巾经纂》在反映宋宗元思想的同时，在传扬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等方面也有巨大的价值，正如《燕大书目》中所讲："其作书之旨，自其善者而言之，可以为立身治国之借镜，颇有裨于学问经济。"它不仅囊括了《资治通鉴》的精华，而且其内容及价值可与《长短经》相得益彰，具有同等的实用价值。

1. 史料价值

《巾经纂》取材主要来自正史，汇集从政处世谋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而且作者的议论又杂采经史子集所载古人行事，叙述历代经典，糅合儒、兵、法诸家思想。这些记述议论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2. 借鉴价值

《巾经纂》选取史书记载的典型事例，不以阴谋诡计、歪门邪道鼓惑人心，提倡博爱、宽容的为政之道，弘扬光明磊落的大丈夫

为人处世风尚，而且作者的议论从为人处世的角度出发，探讨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些记述议论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立身原则和借鉴规范，值得我们加以全面总结。

五、《巾经纂》的整理

《巾经纂》最早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刊刻，共 *12* 册，同治十年(*1871*)重刊本 *5* 册 *1* 函，光绪十六年(*1890*)重刊本 *5* 册 *1* 函，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昧书室校刊本 *4* 册 *1* 函。短短的一百四十年之间四次刊印，可见其影响之大。此后其书罕传，很少见于公私目录记载，于是成为一部鲜为世人知晓的智慧之书。

《巾经纂》取名的由来，据作者自序言："曩哲有写经以藏之巾箱，用备遗轶便稽览者。窃师其义，随所睹闻纂集百一……爰即命之曰《巾经纂》，因类而聚者，亦以群而分、条而列之，得二十种云。"因为此前有明末冯梦龙所著《智囊》一书风靡当时，而本书所记内容也都是些历史上的政治和人生智慧，所以后人又将其称为《新智囊》。

《巾经纂》内在的思想内容主要着眼于政治，无论是讲处世的方法还是处事应变的机巧，作者所赋予的理想的人生价值及完善的人格，依然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传统模式，其所孜孜追求的仍然是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之道。所以今人又将宋宗元的这部旨在从历史实例谈论君子处世立身之道的著作，命名为《正经》。

近几年，国内多家出版社先后都以《正经》为名出版此书，这些书有的是节选，有的是今译，有的是通览，在篇目、卷数、原文上有很大的出入，关键在于没有正式的底本作为依据，有的甚至是错误百出，令人不忍卒读。

此次整理，以光绪庚寅(十六年)依网师园乾隆辛未(十六年)



原本重刊本为底本，每帙前加有“题解”，概括本帙的主要内容及思想主旨；对于原文中明显的讹字径改，不再另出校记；段落划分以“恚庭曰”为依据，标点力求准确；注释侧重于注音与释词，力求简洁；译文随原文逐段进行翻译，力求通顺流畅。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杨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孙文阁负责了全书原文的校订工作，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贾秀军、魏书菊为本书的版本选择提供了方便，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陈金庄、卢超为本书的资料查找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董文武

2010 年 3 月

序

余曩颇耽书，顾慵于记诵，而健于忘，虽涉日者屡，掩卷辄复茫然，还叩腹笥[①]，空空如也。矧自一行作吏[②]，雅俗殊轨，仕优而学，有志未逮，即于簿书之旁偶参剩简，轮蹄之会间挟残编，十寒一暴[③]，尤仅事耳！而结习难蠲，调饥徒切[④]，未遑务博于知新，漫思守约于温故。兴言曩哲有写经以藏之巾箱[⑤]，用备遗轶便稽览者。窃师其义，随所睹闻纂集百一，频年咄咄聊亦成编。纪近敢云及远？日知期免，月忘未堪，持赠差可偿慵，爰即命之曰《巾经纂》，因类而聚者，亦以群而分、条而列之，得二十种云。乾隆辛未夏五，梅花铁石主人宋宗元悳庭甫识。

【注释】

①腹笥（*sì*）：语出《后汉书·边韶传》。指腹中所记之书籍和所有的学问。笥，书箱。

②矧（*shěn*）：况且。

③十寒一暴：冻十天，晒一天。比喻做事时而抓紧，时而懈怠，进展不快。



④调饥：朝饥。早上没吃东西时的饥饿状态。形容渴慕的心情。

⑤巾箱：古时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后也用以存放书卷、文件等物品。

【译文】

我以前十分酷嗜书籍，却懒于默记背诵，而容易于忘事，虽然历经很长时间，合上书卷总是重又茫然无知，回头探寻腹中的学问，一无所有的样子。况且自己一经为官，雅俗差距甚大，做官闲暇学习，有志向未能实现，就在文书簿册的旁边偶尔检阅剩余的书简，在车马出行的聚会间或夹带残缺的书籍，时而懈怠、时而抓紧，过失在于只是应付差事罢了！然而积久的习惯难以除去，饥渴的心情空自急切，来不及致力扩充新得到的体会，姑且思考保持省减温习过的知识。古代哲人有抄写经书来将它收藏到巾箱，用来防备遗忘便于稽览的，我私下效法其中的道理，随着自己亲见亲闻编撰汇集百中之一，历经多年勉强也成为一部书。记录近事岂敢说及久远？每日只知希望努力，每月健忘却不能忍受，持书赠人勉强可以补偿懒惰，于是就将它命名为《巾经纂》，依据类列而汇聚的原因，也是用来加以按类区分、分条列举，得到二十个种类。乾隆辛未年夏季五月，梅花铁石主人宋宗元悫庭谨记。

仁帙

【题解】

“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一种相互亲善的关系，后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标准和境界，第一次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其中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智）、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此后，人们多用“仁”的标准，评判人和事，它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帙设立《卓鉴》、《远猷》、《伟度》、《慧力》四篇。士人为官从政应具有练达经验与高明见识，做到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拥有成就一番事业的伟大度量、宽广胸怀，从政处世要宽容，做到智勇兼备、慧力并生，从这四个方面举例阐释了“仁”的内在含义。这些含有深刻道理的历史故事，对于我们今天为人处世是大有帮助的。



卷一　卓鉴

正经

目虽明不能见其睫，蔽于近也；登高而望远，视非加察而瞭若指掌。人之识量相万，岂不信欤？懵者暗于当事[①]，智者烛于先几，如鉴斯悬，维高莫掩矣。夫前人已事，卓尔有立，其辨妍媸[②]，规得失，料成败，超超乎鉴无遗照者。余不敏，窃愿于此借鉴焉，爰约揽而备论之。

【注释】

①懵（*měng*）者：昏昧无知，糊涂。

②妍媸（*yán chī*）：美好和丑恶。妍，美丽，美好。媸，丑陋，丑恶。

【译文】

眼睛虽然明察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睫毛，是因为被近距离遮蔽；登到高处而瞭望远方，视力并没有增加却能像指着自己手掌给人看一样清楚。人的识见与度量相差万倍，难道不是真的吗？糊涂的人被眼前事情所蒙蔽，聪明的人却能洞察预先征兆，如同明镜悬挂一样，高度无法遮掩了。前人过去的事情，超群出众地存在，他们辨别美好和丑恶，区分得到和失去，预料成功和失败，高超得像明镜般遍照无余。我不才，私下希望从这当中有所借鉴，于是简要归纳出来而加以详细论述。

宋范纯夫言[①]:“曩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②]。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难立朝矣。’”

悫庭曰:“慎厥终,惟其始[③]”,此所贵因不失其亲也。然非阅历之深,鲜弗视为不合时宜之论者,迨至动多瞻顾,坐失名节,悔无及矣。言近指远,堪为入仕者终身模范,故亟录之弁于简端。

悫庭又曰:蜀公所谓不可坐病,只在求字耳。若以公义相知,而恩非私受,则人知虽广,亦何负于立朝?不然既已求之,而但曰不可广,又曷异月攘一鸡之请乎[④]?

【注释】

①范纯夫:即范祖禹(*1041—1098*)。北宋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字梦得,一字淳甫(又作淳夫、纯父)。著名史学家。

②蜀公:即范镇(*1007—1089*)。北宋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字景仁。累封蜀郡公,著名政治家。

③慎厥终,惟其始:语出《尚书·仲虺(*huǐ*)之诰》。

④月攘一鸡: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有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有人告诉他这不是君子之道,他请求减为每月偷一只鸡。后以“攘鸡”为未能及时改正错误的典故。

【译文】

宋朝的范纯夫说:“以前子弟赴官上任,有向蜀公请求题字的人。蜀公不答应,说:‘为官不能到处求人,别人知道承受恩惠多,就难以在朝为官了。’”

悫庭说:“谨慎地对待结局,只有从开始做起”,这就是重视起因而不失去自己的亲近。然而不是阅历的深厚,很少不看成是不



合时宜的观点的，等到做事经常瞻前顾后，白白地失去名誉与节操，后悔也来不及了。语言浅近而含义深远，能够成为入朝做官的人一生的原则，所以迅速抄录下来放在全书的开头。

悫庭又说：蜀公所说的不能平白受辱，只在求人题字罢了。如果因为国家大义互相知心，而且恩惠不是私自承受，那么人们知道得虽然广泛，对在朝为官又有什么拖累？否则既然已经向人请求了，却只是说不能广为人知，这与一个月偷一只鸡的请求又有什么区别呢？

汉马援尝谓梁松、窦固曰[①]："凡人贵当可贱，如卿等殆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后果以贵满致灾，固亦几不免。

悫庭曰：贵为境遇之适，然驭贵之权，操之自上，非己所能与也。惟能处贵而不淫者，斯能处贱而不挠，则可贵可贱之，具在我矣。《书》曰[②]："满招损。"《易》曰[③]："危者所以安其位者也。"其即居高坚自持之谓乎！

【注释】

①马援（前 *14*—后 *49*）：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文渊。曾任伏波将军，封新息侯。梁松（？—*61*）：东汉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字伯孙。梁统之子。窦固（？—*88*）：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字孟孙。娶光武帝女涅阳公主，嗣爵显亲侯。

②《书》：也称《尚书》、《书经》。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儒家经典之一。是商、周两代统治者的讲话记录，及东周、战国时期根据远古材料加工编成的虞、夏史事记载。下面引文出自《书·

大禹谟》。

③《易》:《周易》简称,也称《易经》。周代的占卜书,后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四十八爻,卦有卦名与卦辞,爻有爻题和爻辞;《传》是对《经》的解释,共七种十篇。下面引文出自《易·系辞上》。

【译文】

汉朝的马援曾经对梁松、窦固说:“一般人富贵后应当能够经受贫贱,像你们等人大概不能再次经受贫贱,身居高位要牢牢把握住自己,尽量想想我说的话。”梁松后来果然因为富贵至极招致灾祸,窦固也差一点不能免除。

悫庭说:富贵是境遇的舒适,然而驾驭富贵的权力,却掌握在上司手里,不是自己所能干预的。只有能够处于富贵而不过分的人,才能处于贫贱而不屈挠,那么富贵也好贫贱也好,都在于我了。《尚书》说:“满盈招致亏损。”《周易》说:“危险在安于其位的人。”这就是身居高位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意思吧!

汉建武中[①],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招游士。马援谓吕种曰[②]:“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后果有告诸王宾客生乱。帝诏捕,更相牵引,死者以千数。种亦与祸,叹曰:“马将军神人也!”

悫庭曰:诸王之门,最易招嫌召祸。前汉梁孝王筑忘忧馆[③],延诸名流,极一时文雅之盛。其末也,附和日众,邪慝怂恿作奸[④],几成骨肉之釁。嗣后三国时,曹氏兄弟互立党援,卒之友于否隔,如主簿杨修辈[⑤],亦不能保其令



终。新息此言[6]，实千古金鉴，岂独为吕种设哉？

悫庭又曰：读《书》至《酒诰》、《梓材》之篇[7]，母弟就封，反复诰诫，何其至欤！夫天潢皆一体之亲，自古帝王必先立之防者，正所以维持而安全之也。盖诸王地亲位尊，地亲则易生觊觎，而依附之辈必多；位尊则难为禁制，而骄纵之渐浸启，故法行自近，防之宜立，唯诸王尤不可缓。光武中兴[8]，宗支寥落，且祸患方平，朝廷谅亦未暇及此，然卒至宾客生乱，收捕牵引。防不早立，壅溃实多，伏波先见，圣人复起，岂能易此！徒以椒房之故[9]，不居台鼎[10]，未得预为曲突徙薪之计[11]，良可太息。

【注释】

①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凡三十一年（25—55）。

②马援：见本卷前注。吕种：东汉人，曾随马援征伐五溪，任军中司马，后任沅陵长。

③梁孝王：即刘武（？—前144）。汉文帝次子，母窦太后。先后受封代王、淮阳王。谥孝王。

④邪慝（tè）：犹邪恶。行为不正而又凶恶的人。慝，邪恶。怂恿（sǒng yǒng）：从旁劝说鼓动。

⑤主簿：汉代中央及州郡官府均置，典领文书簿籍。三国魏末丞相府置，员四人。杨修（175—219）：东汉末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人，字德祖。举孝廉，除郎中，又为丞相曹操主簿，谋立曹植。后因对蜀用兵猜出曹操军令“鸡肋”被杀。

⑥新息：今河南息县西南。西汉移治今息县，改为新息县。东汉建武十九年（43）封马援为新息侯，即此。

⑦《书》：见本卷前注。《酒诰》：《尚书·周书》篇名。周公封康

叔于卫，以殷民沉湎于酒，告诫其严禁酗酒。《梓材》：《尚书·周书》篇名。周公封康叔于卫，告以明德慎罚，作为统治的法则。

⑧光武：即光武帝刘秀（前 6—57）。东汉王朝的创建者。汉高祖九世孙。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字文叔。建武元年（25）称帝。统治期间，史称“光武中兴”。庙号世祖。

⑨椒房：汉代后妃居住的宫室。因用椒泥涂壁，故名。也用作后妃的代称。

⑩台鼎：古称三公为台鼎，如星之有三台，鼎之有三足。

⑪曲突徙薪：语出汉桓谭《新论》。战国齐人淳于髡建议邻家将烟囱改成弯的，搬开灶旁柴火。邻家不听，结果起火，那些被烧得焦头烂额的救火人成为上宾。被讥为“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后用以比喻事先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突，烟囱。薪，柴火。

【译文】

汉朝建武年间，各诸侯王都住在京城，竞相树立名望与声誉，招揽游说之士。马援对吕种说：“皇帝各位儿子同时成年，然而旧有的禁例未能建立，如果过多交通宾客，那么重大的案件就会兴起了。你们对此要警惕谨慎。”后来果然有人告发各诸侯王的宾客作乱。皇帝下令搜捕，相互连累，被处死的人数以千计。吕种也遭遇灾祸，感叹说：“马将军真是神奇非凡的人！”

悫庭说：各诸侯王的门上，最容易招致嫌疑招引灾祸。前汉梁孝王修建忘忧馆，延请各位知名人士，达到一时文雅的高潮。到了后来，附和的人日益众多，邪恶的人鼓动做坏事，几乎酿成兄弟间的猜忌。以后的三国时期，曹氏兄弟各自建立结援相助的党羽，结果亲近相爱变成隔绝不通，像主簿杨修这类人，也不能保全



自己有好的结果。新息侯马援这些话，实在是千古的明镜，难道是单独对吕种讲的吗？

悫庭又说：读《尚书》到《酒诰》、《梓材》等篇，周公派同母的弟弟到封地去时，反复告诫，多么的周到啊！帝王后裔都是关系密切的亲戚，自古以来的帝王必定首先确立预防的规矩，正是为了维系而保全他们。大概各诸侯王领地临近、地位尊贵，领地临近就容易产生非分想法，而依赖投靠的人就必然增多；地位尊贵就难以约束控制，而骄傲放纵之心就逐渐增加，所以法律行使始于身边，防范的措施应该建立，对待各诸侯王尤其不能拖延。光武帝中兴时，同宗族的支派稀少，而且祸患刚刚平定，朝廷实在也没有时间顾及这些，这样最终导致宾客作乱，拘捕连累。防范措施不及早建立，堵塞漏洞实在众多，伏波将军马援的预见，即使圣人重出，又怎能改变这种局面！只是因为后妃的原因，不居三公要位，未能事先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实在是令人深深叹息。

申屠蟠生于汉末[①]。游士汝南范滂等[②]，非讦朝政[③]，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④]，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互相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山间[⑤]，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⑥]，或死或刑，惟蟠超然免于评论。

悫庭曰：党祸之烈，玉石同焚，唐之牛李[⑦]，明季之东林[⑧]，皆其明验也。《记》云[⑨]："独言惟恐人闻，独行惟恐人知。"其明哲保身之道乎[⑩]？